

编者按：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包含着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蕴含着丰富的道理、学理、哲理，是一个系统完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刻领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探寻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问题导向和内在逻辑，本刊推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专题，特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沈传亮，《中国长征精神研究》副主编、广西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何成学等专家学者撰文，以飨读者。

“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

沈传亮 李鹏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能够丰富发展的根本路径。“两个结合”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之间的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与契合，“两个结合”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辩证统一关系。“两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指明了“两个结合”的正确方向，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使得“两个结合”扎根实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了“两个结合”文化传统的根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两个结合”具备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

关键词：两个结合；第一次结合；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4-0005-09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这就鲜明指出“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程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供了思想密钥，是新时代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在2023年6月2日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深入阐发。6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深刻领会“党中

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又提出要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再次强调“两个结合”。对“两个结合”，我们要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刻透彻的研究与把握。

一、历史维度：“两个结合”的生成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不懈奋斗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秉承历史使命，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进行“第一次结合”

近代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先后为此目标奋斗，但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然积贫积弱，面临诸多内忧外患，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缺乏先进的领导力量。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横空出世，马克思主义绽放出划时代的光芒。在纷至沓来的各种外国主义思潮中，我国先进分子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与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由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年幼时期，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因而缺乏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2]的深刻认识，在具体实践中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特殊性”紧密结合起来，相继犯了“右倾”与“左倾”的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折戟沉沙，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基于对沉痛教训的深刻反思，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那些“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固守“本本”的思想，毛泽东批评这些思想“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最终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

这些同志自己”^[3]。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依然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在当时还难以被党内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也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影响，使中国革命摆脱了生死困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4]。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突破了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束缚，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成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自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党上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地位与作用。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是蕴含在中国革命实际之中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也多有论及。例如，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古已有之的“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在《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大量引用传统文化的内容，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只是，传统文化还是作为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得以出现，重要性并不是很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推动“第二次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中心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工作重点也从农村转向城市，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与“第一次结合”的不同特征，势必要求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这种结合，即“第二次结合”，目的是为了“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第二次结合”既是应时代之需，更是反思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的产物。“第二次结合”的努力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路线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方面。《论十大关系》强调“以苏为鉴”，辩证客观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对照搬照抄；同时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从理论上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党的八大路线则是从实践中具体探索了“第二次结合”的路径。党的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7]，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就为“第二次结合”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外，党的八大还规划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步走”战略，为“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路线图。在《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路线基础上，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第二次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受“波匈事件”和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二次结合”并不顺利。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将党的八大提出的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渐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经济建设速度上，将党的八大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转变为急于求成、多快好省的“大跃进”。1961年中央虽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国民经济方针予以纠偏，但实际上，依然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究其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推动“第二次结合”中偏离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蕴含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之中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论述，毛泽东将传统文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可鉴资源，强调对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虽主张对其继承，但更多的时候传统文化被视为批判的对象。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功实现并持续推进“第二次结合”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实现并持续推进“第二次结合”。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会上指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持续推进“第二次结合”。随后，邓小平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界定为“中国式的现代化”^[9]。在邓小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针对在改革开放过程所面临的姓“社”姓“资”的讨论，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党的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光辉旗帜，明确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第二次结合”实现了新飞跃。其后，江泽民与胡锦涛一以贯之推进“第二次结合”，分别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与“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由此可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第二次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蕴含在中国改革实

际之中的，历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也进行了诸多论述。例如，邓小平将《诗经》与《礼记》中关于“小康”的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小康社会”；江泽民将传统文化“为德以政”、重视道德的传统发展为“以德治国”的方略，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胡锦涛汲取传统文化中“和合”“以和为贵”的思想发展为“和谐社会”的理念。虽然，传统文化依旧是作为中国改革实际的一部分得以出现，但是其重要性日益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结合”正式出场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着新形势、新矛盾、新任务，需要进一步回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随后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再次论述，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发了“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实践方式。“两个结合”将“第一个结合”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出来，与中国具体实际并排在一起，生成了“第二个结合”，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以弘大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并以“根与魂”来比喻其深厚影响，将其视为文化自信的根源，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既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与精神品质，又大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认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从而为党的科学治国理政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吸收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

念，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汲取传统文化“修身为本”、重视自我修养的思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借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观念，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吸纳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两种“身份属性”辩证统一和生动体现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而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与形态，集中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蕴与特质，开辟了深厚文化传统中返本开新的治国理政新境界，从而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引领。

二、理论维度：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和理论价值

（一）“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

1.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第一个结合”的意蕴。普遍性与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是对特殊性的凝练抽象，而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方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发挥解决中国问题的作用。准确把握“第一个结合”首先需要厘清作为“特殊性”存在的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具体实际既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说其恒定不变主要是指定义本身，说其变动不居主要是指内容的动态性。中国具体实际从长时段看，可以纵观5000年中华文明史，可以近观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的风云激荡；从短时段看，具体实际应该至少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期望等，这些都可以纳入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但一定要注意初级阶段的国情、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期望不是一成不变而是

不断随着实践变化而改变的。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判断，既要看到其中的不变，更要把握其中的变。就目前而言，“第一个结合”就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与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过程就是回应、解决前进道路上各种问题的过程。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有力有效指导的理论，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在探究革命如何成功的过程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在探究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的过程中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如何推进国家强起来的过程中创立的。

因此，就“第一个结合”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之间的相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将其束之高阁，本本化、教条化，“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10]只能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无法发挥科学指导的作用。而应将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原则，但不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生硬“裁减”马克思主义，只抓局部，忽视整体，将马克思主义割裂、碎片化，而应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时代特征，抓住时代脉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2. 互补与契合：“第二个结合”的出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性催生了“第二个结合”的出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有的国家“水土不服”，而在中国根深叶茂、保持常青，主要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本土化，植根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具备中华神韵与特征，获得民众的接纳与青睐。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绵延五千年、包罗万象的文化载体，既有诸多穿越时空的思想精华，也有不少丧失合

理性的糟粕之处，加之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面临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激活。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与时代性恰好可以弥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板，激活其生命力，赋予其现代内涵与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促进了“第二个结合”的出场。首先，在价值追求上，马克思主义秉承群众观，坚守人民立场，为绝大多数人求幸福谋利益，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保民富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主张唯物辩证法，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有无相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异曲同工；马克思阐释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力主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念所见略同；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解放、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神往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不约而同。其次，在实践方法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在借鉴与吸收欧洲乃至全人类智慧基础上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入得以丰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秉承“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理念与“他者”文明交流互通，对内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动态文化样式，保持了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两者都不约而同地重视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致力于充分发挥“改变世界”的实践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经世致用”“学以致用”，崇尚实践的重要作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与契合使得“第二个结合”的出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具体实际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第一个结合”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大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独立出来，促成了“第二个结合”的正式出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凝练而成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坚持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畅通接口。

3. “两个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结合”虽在语序上呈现前后关系，但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排比罗列。“两个结合”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根本路径，相互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个结合”紧密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嵌于“第一个结合”之中，“第一个结合”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激活和升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指出：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从这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随着时代的变迁，“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如在革命时期将古已有之的“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转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提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革开放时期提出“小康社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和谐社会”等思想，这实质上是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特色，将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进入新时代，内嵌于“第一个结合”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独立凸显出来，生成了“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得以正式出场。“两个结合”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目标功能上。“第一个结合”是为了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问题，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无一不体现其目标的现实性。这种“应用”就是为了具体地分析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第二个结合”则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滋养，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而言之，“两个结合”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有机整体，需要以辩证统一的态度来审视“两个结合”的关联与分野。

（二）“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规律

在新时代新征程，“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规律，呈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新图景。“两个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呈现为双向互动、不可分割的整体。“两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生发出“第二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变迁逻辑。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久历史积淀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具体实际中处于最核心、最深层的位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层内容，要全面和科学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必须深入触摸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坚持“第一个结合”，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大地，摆脱教条与本本，切实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相互融通，以特有的民族形态得以呈现，真正实现“具体化”和“中国化”。可见，“第一个结合”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层面，“第二个结合”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历史层面。倘若片面强调“第一个结合”，没有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难以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无法让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花结果就会沦为镜中之花。倘若片面强调“第二个结合”，忽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密切关联，就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因此，只有秉承“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深入挖掘“两个结合”的确切结合点，才能引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可见，“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规律，既重视现实的中国具体实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也聚焦传统的中华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进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与民

族性融会贯通。值得说明的是，“两个结合”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动态发展过程，是需要一以贯之、持续推进的。

三、实践维度：“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一）高举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践行“两个结合”首先要高举旗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两个结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反之，则会走向虚化马克思主义进而改旗易帜的邪路。马克思主义奠定于对现代文明高度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之上，汇集了全人类的思想精华，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是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可谓是高瞻远瞩的“望远镜”，可以穿过遮眼浮云透视历史发展大势，马克思主义也可谓是见微知著的“显微镜”，可以观察入微进而辨别事物之真伪。从鲜活的实践历程可知，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推进事业发展的精神旗帜，必须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与核心，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两个结合”强调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是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恰恰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援意识”来滋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来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越巩固，就越能鉴别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现代转型。

在践行“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反对四种错误思维。第一种错误是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个别论断奉为不可更改的“圣旨”，机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原封不动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永葆活力的行动指南，我们应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始终焕发勃勃生机。第二种错误是用中国具体实际代替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中国的各种实际，受限于自身的片断经验，这样就会悬置马克思主义，将其束之高阁，忽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从而走向经验主义的误区。第三种错误是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妄图儒化马克思主义，导向文化复古主义的歧路。文化复古主义拘泥于“祖制”“老祖宗”，没有充分看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没有清醒认知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形态在现代社会亟需转型，是践行“两个结合”过程中需要旗帜鲜明反对的错误思维。第四种错误是以历史虚无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虚无主义宣扬“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打着“重说”“解密”等名号，以“重写历史”“反思历史”为借口来博取人们的眼球，炮制出“质疑主流”“远离崇高”等错误观念，任意裁剪、曲解甚至伪造历史，妄图遮蔽红色经典与英雄烈士等蕴含的历史记忆，让历史变得“虚无”，实质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此，在新时代践行“两个结合”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抵制各种错误思维，让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不断闪耀真理光芒，指明前行的康庄之路。

（二）扎根实际：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要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走向强起来。践行“两个结合”，需要扎根实际，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尤其需要充分认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科学判断是基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是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体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还体现在民主、法治、生态、安全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是显示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结构性矛盾。“不平衡”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或行业之间等的差距，“不充分”则更多体现在生产力没有丰富到一定程度、改革发展成果不足以惠及全体人民方面。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是“不平衡”的内在原因，“不平衡”是“不充分”的外在形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厘清当前中国国情的根本前提。

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里用“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来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的就是要告诫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在此关键问题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领会，所制定的政策只有依据于此，切不可好高骛远，而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体现出政策的鲜明导向性与科学性。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就应坚持唯物辩证法，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等全方位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由此可知，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基础和依据，只有这样方能真正认知新时代的发展规律，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切实成效。

（三）赓续传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践行“两个结合”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不仅需要理念的革新，还需要运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来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根与魂”“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等内涵丰富的表述，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浩若烟海，需要进行科学鉴别与时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2]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需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贵君轻”“富民养民”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德治理念、“修身立志”“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对其继承和发展，激发其历久弥新的活力，显现其鲜活生动的当代价值；另

一方面要着眼于服务当代、面向未来，以开放包容心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体会中华文化的神韵与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必须通过凝练精华的形式使得广大群众了解和把握，并喜闻乐见。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讲话与文章中多处引经据典，寓意深邃且生动传神。同时，我们要通过学校教育、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惠及更广泛的受众，使之潜移默化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神韵；还可以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先进科技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抒发，借助先进科技创造新颖场景的听觉、视觉、触觉等优势，打造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化精品，赋予传统文化鲜活的时代性，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现跨介质、跨时空交互，激发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从而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这样就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新渠道，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新载体。

（四）胸怀天下：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弘大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胸怀与广阔视野，充分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形成了诸多理论创新。例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新理念，这些新理念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扎根中国具体实际、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并以世界眼光博采众长而形成的。因此，践行“两个结合”需要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胸怀天下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意义。

当下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性霸权霸凌、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问题与挑战接踵而至。当今世界文明版图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多样性，而西方宣扬“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推崇西方文明是人类归宿的“历史终结论”

等理念，排斥甚至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尤其为了抑制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宣言“中国威胁论”，积极开展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出，“和平演变”的图谋未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虽实现显著的跃升，但国际话语权依然与综合国力不相匹配，存在“失声”甚至“挨骂”的现象。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胸怀天下、兼济天下的宽广情怀，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相贯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国家逐渐成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命运交织程度空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进行所谓的独立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为追求，打造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关联，提倡以交流代替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摒弃西方“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发展旧模式，超越西方唯我独尊的单一文明霸权观念，站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凝聚各国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叠共识和最大同心圆，汇聚并肩前行的合力，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注入交流互鉴的新动能，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最终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一种“惠己”与“达人”融会贯通的理念，它不仅推进了中国自身国力的快速发展，而且彰显了鲜明的引领性与示范性，有利于全球共同福祉的汇聚与实现，更促进了“两个结合”的践行。

结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得以成功的秘诀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以科学的理论引领人，以优秀的文化凝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和充沛的文化自信，将党在革命时期就始终坚持的“第一个结合”衍生出“第二个结合”，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两个结合”得以正式出场。通过对“两个结合”生成历史、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的深刻分析可知，“两个结合”极大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从而拓展了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指明了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任务艰巨繁重，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然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解决问题、化解挑战，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持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
- [2][4][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0，534，534.
- [3][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116，311.
- [5] 李忠杰，李明华主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267.
- [6] 毛泽东年谱（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 [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29.
- [1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作者：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李 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钟晓媚